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技术

Technology in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易显飞 著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技术

Technology in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易显飞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技术/易显飞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23025-9

I . ①女… II . ①易… III . ①女性—技术哲学—研究
IV .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6706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NÜXINGZHUYI SHIYEZHONG DE JISH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0.00 元

策划编辑: 杜松石

责任编辑: 陈 倩

美术编辑: 李向昕

装帧设计: 毛 淳 李向昕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综述：从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到技术研究	(3)
第三节 基本思路与研究框架	(17)
第二章 女性主义与技术：概念框架与研究缘起	(19)
第一节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概念厘定	(19)
第二节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缘起	(31)
第三节 从性别理解的流动看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产生	(35)
第三章 文化女性主义：技术的性别隐喻	(45)
第一节 文化女性主义：重估女性文化的价值	(45)
第二节 性别文化的二元结构	(51)
第三节 两种性别文化与“两种技术”	(53)
第四节 白馥兰：技术史上女性的位置与“女性技术”	(58)
第五节 文化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理论趣旨	(62)
第四章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技术领域中的性别平等	(66)
第一节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消除两性差异来实现性别平等	(66)
第二节 现代技术及其制品与女性自由	(76)
第三节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技术反思的三个维度	(80)
第五章 激进女性主义：解构女性对男性依赖的技术进路	(86)
第一节 激进女性主义：“性别阶级”与女性群体的“殖民化”	(86)
第二节 生育技术：父权制控制和侵害女性身体的一种形式	(89)
第三节 医疗技术系统：女性成为“他者”	(91)
第四节 整容技术：文化命令与女性身体的殖民	(93)
第五节 “生物科技革命”：解放女性的手段	(97)
第六节 激进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理论特质	(100)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劳动一分工的解读	(10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联姻”	(103)
第二节 “技术—劳动一分工”的性别视角诠释	(10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理论意蕴	(116)
第七章 生态女性主义：自然技术化与技术“非生态化”	(117)
第一节 生态女性主义：“性别压迫”与“自然压迫”具有内在关联	(117)
第二节 性别视角的“技术—自然—生态”问题探究	(122)
第三节 生态女性主义技术批判：悲观主义基调	(132)
第八章 赛博女性主义：信息技术的女性主义诠释	(134)
第一节 赛博及其特征	(134)
第二节 从哈拉维到普朗特：赛博技术多维解读与女性机遇	(138)
第三节 赛博空间中的女性及其发展	(144)
第四节 赛博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要义表达	(145)
第九章 女性主义语境下的“技术—性别”问题	(148)
第一节 技术与“性别统治”	(148)
第二节 技术与工程实践的性别角色差异：社会建构论的视角	(156)
第三节 技术发展与人类性别：现象学阐释	(163)
第四节 技术发展与女性主义变迁：关联映射	(167)
第十章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反思	(175)
第一节 技术研究的女性主义经验论	(175)
第二节 技术研究的女性主义立场论	(186)
第三节 多学科研究方法	(188)
第四节 “技术—性别—社会”的社会建构论的分析框架	...	(189)
第十一章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价值透视	(195)
第一节 对技术哲学的贡献	(195)
第二节 对女性主义理论的贡献与对女性解放的启示	(197)
第三节 对实践中“技术问题”解决的引导	(198)
结 语	(201)
主要参考文献	(207)
索 引	(224)
后 记	(226)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技术史上为什么少有对女性贡献的记录？是技术史上女性在技术领域本来就“缺席”，还是那些女性技术专家客观存在却被历史隐匿了？现代社会的工程技术领域为什么少有女性技术专家？即使有部分女性技术专家，为什么也只是处于技术“金字塔”的底层？技术是否先天具有男性气质？“性别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因素是否嵌入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的过程与结果中？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或将来可否构建出“女性化技术”？技术领域中是否存在性别不平等的现象？性别与技术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技术发展对女性生活有哪些影响？现代新兴技术是“传统技术”压迫女性的翻版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妇女的屈从地位，还是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翻身”机会？现代社会的种种“技术问题”是否与现代技术的“男性化”存在某种内在关联？……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答，构成了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主旨。

当代社会理论尽管始终想对人类社会做出一般性的陈述，但却忽略了人类社会中一桩最一般、最普遍的事实，即普遍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和不平等问题。社会科学的任务就在于专门研究人类差异和不平等这类问题，但是却一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或者也可能是参与了隐匿这一事实的共谋。^①而女性主义哲学或理论就是为了弥补这一不足而产生的。什么是女性主义？按照阿莉森·贾格尔(Alison M. Jaggar)的理解，它旨在“结束”妇女从属地位的社会运动，这也是女性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基本纲领。不管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有多少自己的主张，在这方面几乎是能够普遍达成共识的。这一基本纲领反映在理论上，即“站在消除性别歧视的立场，用男女平等的观点、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思考妇女问题及一切有关的社会现象”^②。有学者指出：“女性主义以其明确的问题

^①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26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② 荣维毅：《女性主义哲学如何可能？》，见邱仁宗：《女性主义哲学与公共政策》，7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意识、尖锐的批判锋芒和坚忍的实践精神，不仅一步步改变着女性自身的命运，同时也在人类文化知识的勘误和理论空间的拓展方面，表现出独特的革新力量和鲜明的个性。”^①女性主义理论在方法论上增添了“性别分析”这一新维度，以消除包括哲学在内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中的“性别歧视”“性别二元对立”，甚至“性别遗忘”，从而弥补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普遍性”“全人类性”的旗号或外表下“实际”上的女性缺席。^②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学者进入了“技术研究”领域，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认为，“技术”在哲学领域一直处于“边缘化”地位，不属于哲学领域研究的主要对象，他甚至认为技术等同于“无思”。他认为这跟西方哲学注重理论的传统有关，因为哲学一开始就被规定为只同理论思维和人们无法改变的观念领域有关，而与以直观的技术诀窍为基础的任何技术活动相对立。^③所以，技术很晚才进入西方哲学的视野。最早提出“技术哲学”一词的是德国新黑格尔派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现代技术几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子领域，20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知名的哲学家或思想家都无法回避这个领域，因此他们纷纷把技术当作自己的中心议题。^④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在哲学大家族中，即使与关联度较大的科学哲学相比，技术哲学的哲学学科属性也偏弱，地位也比较“卑微”，所以，技术哲学仍然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新生领域，而女性主义对技术的哲学反思又是技术哲学中的一个新生领域。

汉斯·波塞尔(Hans Poser)认为，对技术的审视，必然受制于某种“文化框架”，否则技术就会遭到人类的错误解读。^⑤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文化框架”，力图从性别视角来审视技术，“如果不考虑性别，就不能充分地认识技术。”^⑥女性主义从性别视角对技术史、技术发明、技术

① 刘禾：《女性主义与当代学术成果》，载《中华读书报》，2002-11-13。

② [英]米兰达·弗里克、詹妮弗·霍恩斯比：《女性主义哲学指南》，肖巍、宋建丽、马晓燕译，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③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④ 陈昌曙等：《哲学与社会科学中的“技术转向”——“第八届全国技术哲学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17(6)。

⑤ 肖峰：《人文语境中的技术——从技术哲学走向当代技术人学》，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⑥ Cynthia Cockburn, “The Circuit of Technology: Gender, Identity and Power,” in *Consuming Technologies: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 ed. Roger Silverstone and Eric Hirsch,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32-47.

创新与使用进行反思，这是对传统技术哲学研究视角的有益补充，有利于人们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技术，从而揭示技术的“多重面相”；有利于现代“技术问题”的解决，使技术发明与创新朝着合理性、有益于“性别和谐”的方向变革。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及其成果的传播，不仅可以消解人们对女性的“技术歧视”，促成更多的女性进入技术发明与创新领域，在技术发明、创新与工程设计上做出女性独有的贡献，而且对实现性别平等，提高女性政治学意义上的地位，实现女性的性别解放具有长远价值。以女性主义独特的思维方式对“性别与技术”进行系统的思考，有助于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妇女问题”与“技术问题”。

第二节 研究综述：从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到技术研究

一、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关注的问题域^①

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入科学领域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女性主义学者意识到“传统科学哲学”遗忘了“性别”这一社会变量在科学结构和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从而重拾这一社会因素加以追问，并进一步质疑主流科学哲学的理论前提、假设，提出变革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建构基于女性经验的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范式。19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在《三个基尼金币》(Three Guineas)中说道：“科学似乎不是无性别的，科学是一个男人，一位父亲，并且已被深切认同了。”^②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源于对下列问题的反思：女性为何在科学领域中缺席或被边缘化？为什么科学史对女性科学家的成果少有记载？在科学的研究实践中是否以男性为标准选择科学的研究问题与评价科学的研究成果？等等。纵观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历程，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两次转向，一是从“科学中的女性问题”转向“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③，二是从“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转向对“硬科学”(科学意识形态)中男性偏见的批判^④。相对于技术哲学而言，科学哲

^① 易显飞、常红：《国外关于女性主义科学发现的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战线》，2011(2)。

^② Sue Curry Jansen, “Is Science a Man? New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and Reconstructions of Knowledge,” *Theory and Society*, 1990, 19(2), p. 235.

^③ [美]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夏侯炳、谭兆民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④ Evelyn Fox Keller, “Feminism and Scienc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1982, 7(3), p. 592.

学发展更加成熟与体系化，这使得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相比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也更加理论化与系统化。国外有两本女性主义期刊在对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的推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征兆：文化与社会中的女性杂志》(*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和《希帕蒂娅：女性主义哲学杂志》(*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①的代表性著作《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奠定了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的理论基础，其研究蕴含了经验论、立场论及后现代主义三条研究路径，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二、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进路

总体上，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者以“性别分析”为核心，对科学进行批判与反思。她们以“传统科学观”“建构论”与“科学实践论”为视域或维度形成了三条研究进路。在“传统科学观”的视域中，女性主义者着重“概念分析”，通过对“理性”“客观性”等男性中心主义的概念进行批判，指出科学充满了男性气质与性别歧视，并通过“女性气质”、女性主义“新客观性”等概念构建其理论。在“建构论”的视域中，女性主义者以“理论建构”为进路，通过对建构表征与“反身性”困境的批判来构建女性主义科学衍射新模式与科学主客体交互关系理论。在“科学实践论”的视域中，女性主义者以“异质性”因素的动态分析为进路，使科学的研究视域转向对性别等因素与科学的动态关联作用的研究，揭示“性别与科学”的关系及科学文化的多样性。

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对传统科学观中的概念进行批判，并进行了女性主义的性别“矫正”。科学是正确“反映”自然的表征体系，研究的客观性与合理性来源于科学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这是传统科学观的基本观点。女性主义对“理性”“客观性”等概念进行了性别分析，从社会学、历史学等角度指出了传统科学的性别化，认为传统科学追求的所谓“理性”与“客观性”，其概念本身就是男性化的且蕴含着对女性的歧视。她们试图纠正传统科学理性中的“性别偏见”，提出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客观性”作为研

^① 哈丁以“科学与女性主义”为主题的著作一共有9本，如《女性主义的科学问题》(*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1986)、《女性主义和方法论》(*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1987)、《谁的科学？谁的知识？》(*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1991)、《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Is Science Multi-cultural? Postcolonialisms, Feminisms, and Epistemologies*, 2002年中译本)等。

究的起点，使女性主义理论延伸到科学领域。

在经典的科学哲学中，之所以强调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研究者认为科学活动中存在一个公正的、无偏见的、价值中立的观察者或实验者，并且这样的观察者或实验者应该是男性。女性主义考察科学，以“认识主体”“主体性别”为主要分析工具或对象，认为科学是“父权制”文化下各种社会利益共同建构的结果。“普遍性”不是科学的特征，它本身或者它背后就暗含着某种价值取向。^① 科学领域的“中立”是“男性价值观”的谎言，也只有这样，科学领域的性别压制才成为可能。

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科学批判的温和与保守相比，激进女性主义被称为“激进”是因为两个“过于”，一是对科学的过激批判，二是对女性的价值过分高估。她们认为，科学并非性别“中立”的，所谓传统科学的“理性”与“客观性”纯粹是主观臆断。在她们看来，科学实验、科学知识、科学机构都是被男性控制与主宰的，成为“伤害”女性的工具。传统科学所引发的诸多自身不足及“科学—社会”问题不可能在男权社会中得到解决，唯一的选择就是提倡发展基于女性气质的“好科学”。女性所拥有的“关怀”“韧性”“协作”等彰显了“仁爱特质”与“母性气质”，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要素，也应该是反映“人与自然”重要关系的科学的伦理基础。总体上，激进女性主义高扬女性气质，其“自我欣赏”似乎矫枉过正，建立以“女性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是她们的价值目标。^② 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截然不同的是，她们反复重申与强调两性的“差异性”，并通过强化这种差异性来重估女性气质，主张“女性优越论”，认为这样可以解决科学领域中的性别压迫，进而颠覆父权制统治下的“科学男性中心主义”。当然，激进女性主义理论的“激进”与“极端”招来越来越多的质疑，其“先进性”亦因过于激进而日渐边缘化。

在国内，女性主义科学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的刘兵、曹南燕在1995年曾做过一些“女性主义科学史”方面的翻译和介绍，这是相关领域研究的好的开头。刘兵、章梅芳对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古代科技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梳理。^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吴小英围绕“科学、文化与性别”，基于国外文献，做过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女

^① 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 Catharine A. MacKinnon,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87.

^③ 刘兵、章梅芳：《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两个研究案例的一种科学编史学探讨》，62～15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性主义诠释。^①

董美珍在《女性主义科学观探究》中，对纷繁复杂的女性主义科学研究流派进行了文献梳理，介绍了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其与一般科学观的差异，并对女性主义科学观进行了“批判”。^②她在《“偏见”与“公正”的悖论——兼谈女性主义科学认识论》一文中指出，女性主义科学研究以批判传统主流科学理论的“男性中心主义”偏见为目标，但又寻求挑战科学理论纯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理想，强调偏见的存在与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以及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悖论。^③

李鹭认为，后现代主义因其对“现代性”的激烈批判而在许多方面与当代女性主义“相遇”。在她看来，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如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的理论，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后现代女性主义其实就是后现代哲学的一个分支。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从后现代主义那里汲取到丰富的理论营养，对传统科学展开了性别维度的批判。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双重价值。^④章梅芳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主义科学元堪(feminist science studies)对后现代主义科学思潮中的本质主义、表征主义、二元论残余等展开了进一步批判，出现了后建构主义(post-constructionism)或“物质本体论”(material ontology)的转向。与此同时，对科学技术与性别的理解的变化，导致女性主义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主题和编史取向发生了变化，“身体”“物质文化”“地方性知识”越来越受到关注。^⑤

洪晓楠与她指导的研究生在多篇文章中介绍了女性主义科学的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女性主义经验论科学哲学评析》《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析评》《论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重建及其反思》《另一种科学 另一类哲学——女性主义立场论科学哲学评析》等。

吴森、郑辰坤在《科学和性别相关吗？——对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反

^① 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2~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 董美珍：《女性主义科学观探究》，282~32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③ 董美珍：《“偏见”与“公正”的悖论——兼谈女性主义科学认识论》，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5，32(1)。

^④ 李鹭：《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观》，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27(2)。

^⑤ 章梅芳：《后建构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的理论转向》，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9(3)。

思》一文中认为，现代科学的“缺陷”是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得以进行的原因之一。她们从科学实践中的性别差异出发，批判了科学的研究过程、结果及其评价的种种“不合理”，提出了“强客观性”“反身性”等作为解释工具的概念范畴，反映了女性主义学者对反思科学所做的贡献。然而，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在理论依据方面的不足以及批判过程本身暴露的各种缺陷，最终导致建构“女性主义科学”的愿望不可能得到实现。^①

李鹭与殷杰着重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科学观》一文中指出，女性与自然共处父权制文化体系中导致“被压迫”，使得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在现代合流而形成生态女性主义。科学作为父权制文化的“同盟”，受到了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的批判，生态女性主义科学观同时具备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②

南京大学的蔡仲对女性主义科学观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女性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在内容与方法上都充满着男性中心主义。科学的客观性与逻辑性体现了男性霸权主义政治学，暴露出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主义科学观的认识论来源于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流派与强纲领的社会建构主义流派。女性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夸大了科学的社会之维，而忽视了科学的自然之维，从而把“真理”与“价值”混为一谈。^③

三、国外关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综述^④

总体上，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历经了从“技术中的妇女问题”到“女性主义的技术问题”的理论转向。前者主要关注技术史领域与技术领域中出现的妇女身影，包括重新发现隐匿在技术史后面的女性技术专家与工程师的身影，寻找与论证妇女在技术发展中的成就；后者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技术的性别化特征与性别的技术化特征，在社会与文化结构中探讨“性别—技术”的相互形塑过程，分析技术形成与性别权力、性别意识的相互形构关系。

国外关于此选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 吴森、郑辰坤：《科学和性别相关吗？——对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反思》，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20(6)。

^② 李鹭、殷杰：《生态女性主义的科学观》，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25(1)。

^③ 蔡仲：《对女性主义科学观的反思》，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39(4)。

^④ 易显飞：《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特征探析》，载《哲学动态》，2013(7)。

(一) 技术史领域与技术领域的女性缺席及性别不平等问题研究

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的研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曾有过一段以女性为主导发展技术的黄金时期，那时候男性与女性之间是“伙伴关系”。在以女性为主导的时期，技术呈现出“女性化”特征，艾斯勒称之为“圣杯”的技术。在这个阶段，技术与文化以一种健康和谐的方式向前发展。^①

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时代的文化赋予了“技术”以不同的内涵。女性主义学者通过技术史研究表明，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是首批技术专家。从人类的早期开始，女性就是植物类食物的主要采集者、处理者和储藏者。她们发明了与这项活动有关的工具，如挖掘棍、镰刀、杵与捣具。如果不受男性价值取向的影响来看待大多数更全面意义上的技术研究的话，这些技术发明的重要性都应该得到承认。^② 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奥特姆·斯坦利(Autumn Stanley)认为，“为什么技术史上少有女性发明家”是一个没有应答域的假问题。原因在于，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什么是技术”进行重新界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整个人类的技术史。技术史学家的关注中心从“男人在做什么”转向“人类在做什么”之后就会发现，技术史上的女性发明家不但不少，恰恰相反，“女性持有至少三分之二的技术天空”。^③ 斯坦利进一步指出，当技术的界定扩展后，不能只把“男人的行为”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称为“技术”，也必须把“女人的行为”以及她们所“使用的工具”称为“技术”，“女人在技术领域应重新获得其应得的地位，‘隐姓埋名’不再属于女人，女人对技术所做的贡献比之前所想象的要大得多。”^④

白馥兰(Francesca Bray)从女性主义、人类学、反辉格、后殖民主义等多维视角出发，打破传统技术史研究进路，运用“女性技术”这一基本概念，分析与论证中国古代妇女在房屋空间、纺织生产、家庭劳动与生

^① [美]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未来》，程志民译，3~1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② [美]朱蒂·维基克曼：《女权主义技术理论》，见[美]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等：《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154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③ Autumn Stanley, “Women Hold Up Two-Thirds of the Sky: Notes for a Revised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Sex/Machine: Readings in Culture, Gender, and Technology*, ed. Patrick D. Hopkin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7-18.

^④ Autumn Stanley, “Women Hold Up Two-Thirds of the Sky: Notes for a Revised History of Technology,” in *Sex/Machine: Readings in Culture, Gender, and Technology*, ed. Patrick D. Hopkin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7-18.

育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凸显了妇女在技术史上的位置。^① 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在《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别》(*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一书中，通过“历史的路径”“医学中的性别意识形态路径”“中国医学史上对身体的文化建构路径”，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妇科技术。^②

有的女性主义学者研究发现，技术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有的学者指出，女性所从事的技术岗位的重要性差，女性技术人员相对于男性技术人员升迁机会少，在技术领域的资源使用和控制方面占据劣势，这些导致女性技术人员在研究共同体中出现“累加劣势”或“马太效应”，最终，在技术领域存在的向上流动的“玻璃天花板”阻碍了女性进入技术领域的高层，使女性技术工作者在总体上处于边缘化地位。^③ 女性主义科技哲学家哈丁认为，在科学技术创新共同体中，“指令者”(conceptualiger)通常由男性科技专家扮演，“执行者”(executor)则由女性科技专家来充当^④，不同性别所扮演角色的层次性非常明显。^⑤

根据罗丝托尔(Rossiter)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通过积极地把女性排除在技术职业领域之外，男性对技术的控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障，这对性别劳动分工在目前的延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⑥ 温迪·福克纳(Wendy Faulkner)在研究了工程设计领域中的性别问题后发现，尽管从公共政策角度而言，各国政府都支持妇女进入技术与工程领域，但是情况并不乐观。福克纳认为，形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因为技术的“男性化”与男性的“技术化”相互建构，一体两面，属于同一个过程。^⑦

- ① 刘兵、章梅芳：《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两个研究案例的一种科学编史学探讨》，148~14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② 刘兵、章梅芳：《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两个研究案例的一种科学编史学探讨》，57~59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③ [美] 玛丽·弗兰克·福克斯：《女性与科学职业》，见[美]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等：《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157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 ④ Sandra Harding,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65.
- ⑤ 王宏维：《论哈丁及其“强客观性”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认识论语境分析》，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 ⑥ [美]朱蒂·维基克曼：《女权主义技术理论》，见[美]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等：《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147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 ⑦ Wendy Faulkner, “The Power and the Pleasure? A Research Agenda for ‘Making Gender Stick’ to Engineer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2000, 25(1), p. 110.

2016年6月21—26日，美国技术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SHOT)学术年会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技术与性别”成为热门话题。美国技术史学会主席白馥兰、美国技术史专家露丝·施瓦茨·柯旺(Ruth Schwartz Cowan)均围绕这一主题做了大会主题发言。除此之外，还有三场与性别议题相关的圆桌会议，如由荷兰技术社会学与技术史家维贝·比克(Wiebe Bijker)组织的圆桌会议讨论了技术、性别平等和青年赋权议题；由美国女性主义技术史家亚玟·莫恩(Arwen P. Mohun)组织的圆桌会议讨论了技术与性别关系研究的本土情况。从上述议题设置我们可以看出，“性别与技术”研究已经引起了技术哲学、技术史领域学者的普遍关注。^①

(二)女性主义的技术问题研究

技术带有“性别印记”吗？对此，不少学者以“性别”为根据，对技术进行了划分界定，如技术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把技术划分为容器技术与支配技术，理安·艾斯勒把技术划分为“圣杯”的技术与“剑”的技术，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gan)把远古文明时期的技术划分为采集技术与挖掘技术。不少女性主义学者都认为，现代技术不是中性的，是男性价值与文化的体现，是男性中心主义构建的产物。在这些学者看来，把技术看作只适合于男性从事的活动，以及把技术等同于男性的观念之所以长期存在，并非基于本质主义的先天的性别差异。相反，它是性别的历史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产物。^②温迪·福克纳所著的《技术湮灭：妇女生活中的技术》(*Smothered by Invention: Technology in Women's Lives*)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的技术进行考察，指出技术并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性别统治的行为意志。辛西娅·科伯恩(Cynthia Cockburn)与苏珊·奥姆罗德(Susan Ormrod)合著的《制作中的性别与技术》(*Gender and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通过跟踪微波炉从设计到使用的整个过程，指出性别与技术的相互形构方式与路径。^③

较女性主义科学而言，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则更热衷于从某一专业技术领域入手，关注某一微观具体技术对女性的影响。现代技术带

① 章梅芳：《性别与技术：国际技术史研究新趋势——美国技术史学会学术年会侧记》，载《中国妇女报》，2016-07-05。

② [美]朱蒂·维基克曼：《女权主义技术理论》，见[美]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詹姆斯·彼得森等：《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154页，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③ Cynthia Cockburn & Susan Ormrod, *Gender and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 London, Sage, 1993, pp. 5-20.

给女性的到底是解放还是噩运？凯瑟琳·保利·摩根(Kathryn Pauly Morgan)与凯西·戴维斯(Kathy Davis)通过对整容技术的争论^①，反映出不同派别的女性主义者对技术持有迥然不同的立场。在两人的理论偏向中，带有激进女性主义色彩的摩根认为，整容技术是维护异性恋文化的工具，而异性恋文化正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带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色彩的戴维斯并不断然否定整容技术，而是希望激进女性主义者倾听妇女自己的声音。^②

很多女性主义者对与女性相关的生育技术进行了反思。在把生育看作女性受压迫根源的女性主义者看来，现代生育技术的出现可以使女性摆脱沦为“生育机器”成为可能，从而进一步把女性从承担人的再生产这一自然职责下解放出来。激进女性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认为，女性处于性别关系的从属地位的因素之一就是生理因素，现代技术的发展在历史上破天荒地使得改变女性的生物学基础成为可能，有效的避孕技术、脱离子宫怀孕的技术甚至可能出现的“男妈妈”的“人造子宫”技术都将打破建立在传统生理基础上的“生育—生产”的二元分工，从而把女性从“烦琐的生物再生产中解放出来”。“人类生育领域内的性别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比任何地方都更具争议性。妇女是生育任务的承担者，也是婴儿抚育的承担者。这意味着生育技术对于她们来说具有特殊意义。”^③与此针锋相对的是，有些女性主义者并不认为现代生育技术是女性的“福音”，恰恰相反，她们认为生育技术是父权制压迫女性或男性向女性生育权力领域进攻的武器。摩根指出，生殖技术带来的正是父权制权力或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殖民。^④女性之所以无法摆脱生殖技术对她们进行的新一轮殖民，是因为父权制文化系统在这个领域带来的新压力：当越来越多的生育技术与测试手段被发明与创新时，伴侣、

-
- ① Kathryn Pauly Morgan, “Women and the Knife: Cosmetic Surgery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Sex/Machine: Readings in Culture, Gender, and Technology*, ed. Patrick D. Hopkin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69–271.
 - ② Kathy Davis, “Facing The Dilemma,” in *Sex/Machine: Readings in Culture, Gender, and Technology*, ed. Patrick D. Hopkin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7.
 - ③ Georgina Firth, “Re-negotiating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The ‘Public Foetus’ Revisited,” *Feminist Review*, 2009, 92(1), p. 55.
 - ④ Kathryn Pauly Morgan, “Women and the Knife: Cosmetic Surgery and the Colon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Sex/Machine: Readings in Culture, Gender, and Technology*, ed. Patrick D. Hopkin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73.